

我 爱 中 国



从1974年
第一次踏上中国的
土地那天起，我就深深
地爱上了这个国家

[日] 丹羽惠造 著

从1974年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那天起，我就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并且从那一刻起就决定要为日中两国的友好交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对于日中的友好交流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而对我来说，接收中国派遣的研修生无疑给我提供了一种很好地交流方式，让我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的激情和斗志昂扬，也看到了这个国家的希望……

人
民
出
版
社

我爱中国

[日] 丹羽惠造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于宏雷

装帧设计:曹 春

责任校对:王 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爱中国/[日]丹羽惠造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1

ISBN 978-7-01-009332-1

I. ①我… II. ①丹… III. ①中日关系-友好往来

IV. ①D822.2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2165 号

我 爱 中 国

WO AI ZHONGGUO

[日]丹羽惠造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5

字数:13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09332-1 定价:1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1. 批林批孔年代初次访华	1
2. 80 年代初访华	24
改变一生命运的访华	27
协商接受研修生细节	37
签订接受研修生协议	44
幸会胡锦涛先生	70
3. 80 年代中后期访华	92
率 164 名成员访华	92
交往才能增进理解	102
海口第一家日本料理	117
1989 年 6 月访华	121

4. 90 年代初访华	126
中国西北行	129
研修事业 10 周年	132
90 年代的研修生事业	138
研修事业 15 周年	169
5. 21 世纪初访华	184
研修事业 20 周年	184
两个荣誉市民	187
2008 年参加“日中青少年友好交流年”的 感想	189
后 记	200

1. 批林批孔年代初次访华

20 世纪 70 年代是日中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日中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民间，更是在政府间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性进展。日中两国政府经过多轮友好的协商谈判，于 1972 年 9 月 29 日正式宣布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从而使日中两国人民渴望已久的日中关系正常化终于得以实现，翻开了日中友好交往史上新的一页。1974 年我之所以能够踏出国门到中国访问，以及其后 34 年内数次对中国的成功访问，也正是得益于日中邦交的正常化。一方面日中邦交正常化给我提供了访问中国的契机和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我的身体力行，我的访华经历又为日中关系的友好、健康发展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这里，先把我访华前的日本政府所面临的局势作一简短叙述，以方便读者能够更加清晰透彻地了解当时我访华的时代背景，以及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来龙去脉。

众所周知，战后日本政府一直坚持对美国“一边倒”的追随外交政策，虽然日本政府在 60 年代因日美安保问题



以及日美经济摩擦等问题出现离心倾向，但其对外交政策只是进行了细枝末节上的政策微调，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日美基轴”这一方针路线。所以说战后日本的外交政策受美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战败后一直到 1951 年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期间，日本处于美国对日单独占领期，没有外交权可言。因此，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服务于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受制于美苏冷战的需要。也正是这个原因导致，新中国政府成立以后，日本也追随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外交上不予承认的政策。

正因为如此，邦交正常化之前的日中交往仅限于民间以及一些半官方的往来，尚未有官方的正式交往。中国政府周恩来总理的“大力发展民间交往，以民促官”的建议受到日本经济界的普遍欢迎。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为日中邦交正常化打下坚实基础的两位人士：前通产省大臣高碕达之助和中国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先生。正是因为有了他们在恢复邦交前的务实的沟通、交流，才推动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顺利进行。1962 年 11 月，前通产省大臣高碕赴华，与廖承志会长签订了日中贸易备忘录（《日中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开启了日中关系史上著名的“备忘录贸易”的发端。日中贸易备忘录取廖承志会长（LIAO）和高碕先生（TAKASAKI）姓氏的首字母，故而简称为 LT 贸易，LT 贸易模式当时在日本特别是日本经济界名噪一时，颇受日本经济界的欢迎。1964 年 4 月，日中双方达成了由高碕达之助和廖承志首倡的在北京和东京互设办事处的协议。这是日中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标志着日中关系由民间

转入“半官半民”阶段，为日中邦交正常化作了很好的铺垫工作。

但是好景不长，是年11月，自民党内“亲台派”的佐藤荣作赢得自民党总裁选举，担任总理大臣，而且一做就是7年半。佐藤执政的7年半时间里，推行“日美韩台联合遏制中国的战略”，从而使刚刚起步的半官方性质的日中贸易停步不前，民间贸易也陷入了低谷。

佐藤内阁时期一直对中国采取敌视的态度，阻碍日中民间的友好交往。特别是在其政治生涯的后期，他疯狂地干涉中国内政、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等诸多方面使得本就脆弱的日中关系急剧恶化。但由于日本国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势不可挡，日中友好团体等各民间团体、财界著名人士等纷纷向中国政府做出友好表示，相互间的友好交流往来日渐频繁，所有这些都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地影响着自民党内阁的政策取向。

除了日中两国民间作用之外，美国绕过日本而接近中国的“越顶外交”——1971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突然宣布访华给长期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佐藤政府带来的巨大冲击，也无疑对日中邦交正常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对当时《上海公报》提出的“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异议。美中双方确认，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国际争端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加以解决；两国不在亚太地区谋取霸权，也反对任何第三国在这一地区确立霸权。

时值佐藤内阁末期，内阁的支持率降至战后历届内阁的



最低点，企业界也主张“换马”，以便打开僵局。在这种形势下，执政七年零八个月之久的佐藤内阁只好于1972年7月6日宣布总辞职。次日，田中内阁成立。

田中内阁从1972年7月7日开始到1974年12月9日结束，总共不到两年半的时间，执政时间不算长。但这几年正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变的时期。在国际方面，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方向发展，美国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遏制中国”政策，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并与中方在上海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美联合声明，迫使一贯追随美国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新的选择。1972年7月，中国派出由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孙平化为团长的由208名团员组成的上海芭蕾舞剧团赴日本访问和公演。孙先生曾回忆道：“我们舞剧团一行在佐藤内阁时代从北京出发，在田中内阁时代到达东京，时隔三天，经历了两届不同的内阁。”

田中就任首相第一次会见新闻记者时就公开表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机业已成熟，我要认真地处理这一历史性课题”。大平正芳外相就任后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为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新内阁首相或外相需要前往访问中国。”日中双方通过民间渠道和长期大量的友好工作，日积月累，越来越显示出明显的效果。日中邦交正常化成为当时日中舆论界的热门话题，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已形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上下一致的巨大潮流。

1972年9月25日至30日，日本国田中角荣首相、大平正芳外相、二阶堂进官房长官及49名政府官员乘专机到达

北京，并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期间，田中首相一行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中国领导人的接待和会见。在26日至28日期间，日中双方进行了四次首脑会谈和三次外长会谈，主要内容是台湾问题和结束战争状态问题等。经过多次磋商，双方较快地就邦交正常化问题达成了一致。29日，两国政府签署了《联合声明》。声明庄严宣告：“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同意进行以缔结贸易、航海、航空、渔业等协定为目的的谈判”。这一声明在日中两国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随着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两国间交流日益频繁，日中友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体现在政府间，还体现在民间交流方面。

复交后友好来往的开幕锣鼓，是由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敲响的。1973年4月，廖承志会长率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来日进行访问。这个代表团是应日本各界的共同邀请访日的。对该团的邀请信虽然是在复交前的1972年4月，由各友好团体、贸易团体、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等的负责人共22人联合发出的，但却是以这次中国人民庆祝恢复邦



交的使节来日本访问而实现的。该代表团由 55 人组成，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任团长，副会长张香山、秘书长孙平化分别出任副团长和副团长兼秘书长。团员包括了各方面的代表人士。

复交后日中关系的新形势最集中地表现在双方各界广泛进行的各种交流上，其势如潮水奔流，迅速获得了发展和扩大。在数量上是复交前的几倍、几十倍，而且改变了复交前那种以日本方面访华为主、中国方面很少访日的状况。1974 年，我作为“友爱青年联盟”的一员进行的访华活动在众多的友好交流活动中只是冰山一角。1973 年 6 月 24 日，神户市首先和天津市结为友好城市，成为此后日中之间结成上百对友好城市、友好县省的开端。体育界的交流也接连不断。肩负日本未来的青年采取了“青年之船”、“青少年之船”的新形式访问中国，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扩大了同肩负中国未来重任的青年进行交流的机会。这种交流在日本方面绝大部分是通过民间渠道进行的。复交后，仅 1973 年和 1974 年进行的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整理起来就足以写成一本书。

以上说了这么多的“事情”，接下来该讲“人物”了。

我想先介绍一下在战后日中友好交流几十年的历史，中国几位长期从事日中友好交流、并被称为“日本通”的友好人士。除了前面谈到的中日友好协会的会长廖承志先生之外，我也曾与该协会的副会长张香山、秘书长孙平化这两位先生有过多次比较深入的交往经历。

与张香山先生的交往虽然仅仅限于拜会时的交谈，但

是，他在书法方面颇深的造诣却早已名声在外。张先生的声名在日本虽不是家喻户晓，但对于当时致力于日中友好或研究日中关系的人士来说，却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作为中国中日友好协会的副会长，张先生跟廖承志先生一道致力于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邦交正常化以后依然没有停止过对日中和平友好的努力。他历任中国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以及中国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务。另外，张先生的一口流利的日语和一手漂亮的书法，为日本民众加深对张先生的了解增色不少。日中邦交正常化前后，日本政界、经济界以及民间中有许多人士通过直接或间接等各种交流渠道都拥有张香山先生的书法作品，并且以拥有张先生的作品作为自己了解中国、热爱中国的“文化资本”。甚至有许多人还以此炫耀自己为“中国通”。张香山先生的书法功底和人格魅力可见一斑！

访华期间，我也有幸在北京得到了张先生的一幅大作。这是一幅以象征日中友好的富士山和万里长城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据张先生所言，这幅画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以后所创，可以说是对日中邦交正常的纪念之作。

丰富的经历、流利的日语、漂亮的书法，集这些诸多优点之大成的张香山先生可以说是一位日中两国友好的象征性人物。

与张香山先生相比，孙平化先生则更像是一位致力于日中友好的实干家和外交家。早在 1964 年，高碕先生与中方廖承志会长达成协议在北京和东京互设办事处时，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秘书长的孙先生便被委以重任，担任廖承志事务

所东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全权处理日中经贸中的中方事务。孙先生的日语说得相当的流利，言谈举止非常儒雅，态度也非常谦逊和蔼。

我认为，虽然说孙先生当时担任廖承志事务所东京联络处的首席代表，但其职位并不能算是一位国家级的领导人，何况日中两国还没有恢复邦交，他甚至不能算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官员。但是，他在日本的知名度还是相当高的，特别是在日本的政界、新闻媒体界等领域，孙先生吸引了很多目光。孙平化先生是由中日友协副秘书长一步步升任为中日友协会长的，每一步都与他对日中关系友好发展所作的坚实努力分不开。所以，每当日中关系出现磨擦矛盾、孙平化先生出访日本时，日本的各大新闻媒体都相继对他的访问活动进行相关报道，包括与日本首相、外相的会见活动等都作为新闻卖点大篇幅进行宣传，连日本 NHK 电视台也在其早间七点的新闻里作为要闻进行播放。

孙平化先生虽然不是国家领导人，他的言谈只是在忠实履行国家的决策，并不能代表国家的决策，他只是在服从于国家的决策，而非制定国家的决策或影响国家的决策，但当时日本的一些新闻媒体乃至一些政治家们都出现了判断上的偏差，或者说认识上的极端，认为孙平化先生的言论就等于中国国家官方的决策，甚至还出现了“就日中关系孙平化先生发表了……的言论”诸如此类的相关报道。这显然是一种有失准确性的认识，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如实反映了孙平化先生在日本、日本人心中的地位 and 影响力。

下面继续复交后中国中日友协代表团访日的话题。来日

以后，应日本方面的邀请，以团长为中心，分成三个分团，访问了北陆方面、北海道、东北、九州和冲绳。代表团在一个月期间访问了38个都道府县，在日本列岛掀起了日中友好的热潮。4月21日，中方中日友好协会访日代表团还应邀出席了在东京开幕的日方日中友好协会1973年度的全国大会。两国的友好协会决心进一步加强团结，增进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为日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而努力。日中友好不再仅仅是日中民间的“两厢情愿”了。4月24日，由自民党、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第二院俱乐部和无党派国会议员400多人组成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在东京成立，会长为藤山爱一郎。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是为了促进日中友好而建立的组织。藤山爱一郎会长在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成立大会上表示，恢复日中邦交是建立日中友好关系的新起点。今后，日中友好议员联盟的成员要同心协力，进一步促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发展。联盟成立大会的宣言说，日中两国永远保持睦邻友好关系，对亚洲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缺少的。国会议员在统一意志下积极地促进这种关系，意义重大。宣言还说：“当前，我们决心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和为具体发展各方面的友好关系而努力，为使两国关系的完善而竭尽全力。”

来而不往非礼也。作为对中国中日友好协会代表团访日的积极回应，日本政府也派遣了由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第三次日中青年学生交流团于1974年2月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友好访问。这—次的青年学生交流团由日本国内的四个团体组成，我所在的“友爱青年联盟”有幸被选中。这次对



华访问团是在日中恢复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方面派出的第一个友好代表团，之所以选择青年学生作为交流的对象也是基于对日中两国世代友好共处的考虑，因此责任重大、意义非凡。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是与中国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从此也揭开了我与中国友好交流的篇章。

我所在的“友爱青年联盟”是由日本前首相鸠山一郎（上一任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于20世纪40年代创办的。联盟的创办起因于鸠山先生流放期间受到奥地利哲学家库登霍夫、卡尔鲁的“博爱”思想的影响，主张在日本开展所谓的“友爱革命”。1953年正式成立，命名为“友爱青年同志会”，1973年后才更为现在的“友爱青年联盟”。当时的“友爱青年联盟”在日本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袖珍青年组织。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组织结构大体为：委员长1人，全称是“友爱青年联盟中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副委员长2人。除委员长是专职的以外，其他2人均属于兼职，每个人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人如其名，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年龄基本相同，都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友爱青年联盟”的主要经费来源是政府颁发的，即主要是由日本文部省下发的补助金。按照日本政府的规定，接受补助金的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必须常驻东京，因此，当时“友爱青年联盟”的委员长一职是由一名常驻东京的事务局长担任的。我担任“友爱青年联盟中央常任委员会议长”一职。这是一个空头职位，我是自该组织四十年代成立以来第一个担任该职务的人。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特意为我增设的一个职务。

此次访华团总共由四个团体的 30 人组成。因冠以“青年学生交流”之名，顾名思义，青年学生是必不可少的成员。在这 30 名成员之中，有 10 名是从大学中文系直接选拔的大学生。他们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样沟通起来就减少了很多障碍和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既然是学中文的大学生不去中国实地考察学习一下岂不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另有 10 名是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职员；还有一些是企业的负责人和友爱青年联盟的负责人等。我便是属于第三种性质。当时“友爱青年联盟”作为其中一个团体，共有 3、4 名负责人。他们希望从“友爱青年联盟”的组织中再挑选一人参加访华团，并指名要我去。

由于我们访华时的 2 月份日中两国尚未签署日中航空协定（日中直航是在当年 10 月才实现的），所以我第一次访华是从取道中国香港开始的。

从日本坐飞机抵达香港后，需要换乘火车来到香港与中国内地的交界处，下了火车从站台直接步行穿越了一座大约 15 米长的铁路桥后进入了深圳。因为是在站台内，所以稍显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当时的深圳是什么样子。后来才知道在中国尚未进行改革开放之前，深圳可没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只是一个隶属于广东省宝安县的小渔村。世事难预料，谁又会知道 20 年后它会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呢？

当时中国的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部的 3 位工作人员在深圳一侧等着迎接我们。

从深圳又乘火车到达了广州。按照日程我们将从广州再



乘飞机去北京。出了广州火车站坐上前往白云机场的大巴以后，才算真正看到了当时中国的城市。

对于日本人来讲，当时的广州就好像另外一个世界，甚至不能相信在同一个地球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地方，着实令我们吃惊不小。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想象中的截然不同。亲眼目睹了当时的广州后，似乎减少了没能看到深圳而产生的遗憾之情。当时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无心生产建设，所以即使像广州这样的省会城市也是一团糟糕。

在广州，还遇到了一件虽不可思议却又令人深思、给我们极大感触的事情。当我们乘坐大巴途经广州市中心地带时，看到了一座带有围墙的建筑物，围墙有几百米长、大约有5米高，心生好奇，于是我们便不解地向负责接待的中国全国青联的工作人员咨询其用途，结果被告之这就是监狱。当时的我们着实吃了一惊。按照日本人的理解，监狱理所当然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因此，我们以为里面关的应该也是犯人，但中方接待人员却告诉我们说因为在中国没有人犯罪，所以这座监狱里面没有犯人。我们很是不理解。在日本的话，这纯属无稽之谈。当时，访问团成员里有许多青年学生，其中的一些人在大巴车里大声说道：“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哪个国家都有罪犯，没有罪犯的国家是不存在的。”车里的其他日本年轻人也开始对此议论纷纷，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此次交流活动从一开始就因两国青年认识上的巨大分歧而陷入了“僵局”。

我觉得，两国的年轻人之所以会陷入“僵局”，是有深